

# 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的 中国通货膨胀比较研究 (1938—1996年)

颜嘉川 编著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bjtu.edu.cn>

# 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的 中国通货膨胀比较研究

(1938—1996 年)

颜嘉川 编著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 内 容 简 介

本文共五章,按时间顺序描述和分析了1938—1996年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

第一章为“旧中国战争型超级恶性通货膨胀(1938—1949年)”;第二章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通货膨胀(1949—1952年)”;第三章为“计划经济时期的抑制性通货膨胀(1953—1978年)”;第四章为“改革开放时期的转轨型通货膨胀(1979—1996年)”;第五章为“比较视野下的中国通货膨胀”。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的中国通货膨胀比较研究:1938—1996年/颜嘉川编著. —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9

ISBN 7-81082-881-9

I. 现… II. 颜… III. 通货膨胀-研究-中国-1938—1996 IV. F8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12993号

责任编辑:井 飞

出版发行: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电话:010-51686414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斜街44号

邮编:100044

印 刷 者: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0×203 印张:6 字数:151千字

版 次: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1082-881-9/F·194

定 价:30.00元

---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向北方交通大学出版社质监组反映。

投诉电话:010-51686043; E-mail: press@center.bjtu.edu.cn。

## 中文摘要 ■ ■ ■ □

在实行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时代，一旦货币当局发行失控，大面积、长时间的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自 1935 年中国纸币制度确立至 1996 年的 60 多年间，中国绝大多数年份存在通货膨胀。所以，从历史视角来研究中国通货膨胀问题，不仅能加深对通货膨胀基本的、一般的特征的理解，而且能加深对中国通货膨胀特殊性的认识，这种理解和认识的加深，毫无疑问有利于将来我国通货膨胀问题的解决。

1935 年，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改革，废除白银本位制度，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具有无限法偿能力，并且规定法币能按照政府规定的汇率自由兑换成英镑、美元，法币币值以汇价的大小来衡量。但法币改革之后第三年，抗日战争爆发，军费开支浩繁，财政赤字因之不断膨胀，国民政府基本上不再按照外汇存量及外汇与法币的汇率来确定法币发行额，而是根据财政赤字的大小来确定法币发行量。并且，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法币不能自由兑换成外汇，完全成为一种不兑现的货币，这就为国民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大开方便之门。从 1938 年开始，中国开始出现通货膨胀，此后愈演愈烈，至 1949 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时，通货膨胀已至不可收拾程度，这就是旧中国长达 12 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新中国成立后，通货膨胀并没有因旧政府消亡而随之自动消失。新生人民政权综合采取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成功遏制了积重难返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创造了世界金融史上一大奇迹。但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经

济不得不再次走上战时经济轨道，由于财政经济异常困难，物资供给相当缺乏，所以，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我国一直存在通货膨胀。1953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1953—1978年，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前，这个时期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商品、劳务价格受到国家的严格管制，实行计划价格制度，使我国经济生活中不可能出现明显的全国范围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抑制性特点。但是在“大跃进”时期，由于经济政策的严重失误，引起物资供应严重短缺，货币超量发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无法再控制物价的上涨，出现了显性通货膨胀。不过，即便是“大跃进”的显性通货膨胀，也还是受到了国家的严格控制，带有浓厚的抑制性色彩。因此，“大跃进”时期的通货膨胀可以看作是计划经济时代抑制性通货膨胀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一直存在通货膨胀压力。1978年开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国进入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并存的“双轨制”时代，或者说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转轨”时期。在经济转轨时期，计划经济时期长期被压抑的通货膨胀随着物价改革的步步推进和经济货币化程度的加深而逐步释放。从1979—1996年，我国先后出现了四次通货膨胀，即1980年通货膨胀、1985年通货膨胀、1988年通货膨胀、1994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一直是阻碍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健康增长的主要因素。

经济史就是按时序解释经济历史，昨天所发生的经济事件，在今天看来就成为了经济历史，今天的经济史就是过去的应用经济学，所以经济史学工作者应该一只眼看过去，一只眼看现实，经济史研究也应该坚持沉淀论与跟随论的统一，只有经过了一段时期的沉淀期，才能透过历史表象的迷雾看清历史真相，只有跟随历史前进，才能及时总结经验与教训，从而更好地为现实经济服务。本文坚持沉淀论与跟随论的统一，把研究对象的上限断在

1938年,下限断在1996年。理由申述如下。第一,1935年法币改革确立信用货币制度之后,通货膨胀大面积、长时段发生成为可能,但并不是信用货币制度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1935—1938年初中国的物价是稳定的,中国通货膨胀开始于1938年上半年,所以,本文把上限断在1938年。第二,1996年既是1994年通货膨胀的终结,也是转轨时期短缺经济条件下转轨型通货膨胀的终结。1997年之后,中国进入长达六年之久的通货紧缩时期,中国金融运行进入了另一个完全相左的周期,2003年底至2005年初出现的通货膨胀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确立的背景下发生的,它与短缺经济条件下转轨型通货膨胀的形成机理及治理措施已有较大的区别,所以,转轨型通货膨胀的下限宜断在1996年而不是2005年。此外,由于沉淀时间太短,对刚刚过去的通货膨胀还难以看清,所以,下限也不宜断在2005年。

本文共五章(不记导论和结语),按时序描述和分析了1938—1996年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

第一章标题为“旧中国战争型超级恶性通货膨胀(1938—1949年)”。本章首先描述了1938—1949年的通货膨胀状况,然后分阶段探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通货膨胀的成因、社会经济效应及国民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治理与失败原因等。抗战时期通货膨胀的成因主要有三:(1)物资供需的严重失衡是抗战时期物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2)日伪对法币的蓄意破坏加剧了法币币值的下跌;(3)货币供给的增加是造成抗战时期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采取了如下措施反通货膨胀:(1)管制信贷,紧缩信用;(2)实行田赋征实,增加物资供给;(3)推进银行储蓄,回笼货币;(4)抛售黄金与开展黄金储蓄。解放战争时期通货膨胀的原因主要有:(1)财政赤字有增无减钞票发行额继续以几何级数递增是这一时期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2)国民政府对战后经济形势判断的失误直接推动了物价上涨;(3)人们的通货膨胀心理预期拉上了物价。解放战争时

期国民政府主要采取了实施金融管制和币值改革两条措施来治理通货膨胀，但国民政府所实施的所有反通货膨胀措施都是强制性行政手段，不但没有遵行经济规律（如没有采取增加物资供给、减少货币供应等治本之策），而且还违反了经济规律（如“八一九”币值改革），这就是国民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的战争上输得一败涂地的根本原因。

第二章标题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通货膨胀（1949—1952年）”。本章首先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四次通货膨胀，分析了引发通货膨胀的四个原因：（1）建国初期，国家财政收支存在巨额赤字，新生人民政权不得不依靠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这是建国初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2）物资供给无法满足最基本的生产需求和人民的最低生活需求，这种物资供需严重失衡进一步推动了建国初年的物价上涨；（3）资产阶级的商业囤积与投机行为加重了建国初年的通货膨胀；（4）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也对建国初年的物价上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把人民政府治理建国初期通货膨胀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治标阶段（1949年3月—1950年2月），即严厉打击不法资本家的投机行为，遏制物价上涨。第二阶段：治本阶段（1950年3月—1950年4月），即人民政府着手统一财政收支，减少财政赤字，从源头上遏制通货膨胀。人民政府的治本措施成功地治理了旧中国长达12年之久的超级恶性通货膨胀，国民经济也因物价的稳定而出现了大好形势。但朝鲜战争的爆发再次打乱了中国国民经济恢复的步伐，军费开支的增多及战备物资的紧缺再次引发了中国物价的上涨。人民政府加强市场管理，采取取缔投机商业、统购棉布棉纱、紧缩银行信贷、增加进口物资、冻结公家银行存款及增强国有贸易实力等六个方面的措施，稳定了物价。旧中国通货膨胀的程度在世界金融史是空前的，新中国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在世界金融史上也是空前的，新生人民政权用1年多时间成功治理了如此恶性通货膨胀在世界金融史上同样也是空

前的,这段历史经验值得认真总结。本文总结了三条经验:(1) 人民政府把币制改革作为治理通货膨胀的先导,为成功治理通货膨胀提供了前提条件;(2) 共产党人大公无私,保证了通货膨胀的成功治理;(3) 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政治手段联合使用,保证了通货膨胀的成功治理。

第三章标题为“计划经济时期的抑制性通货膨胀(1953—1978年)”。1953—1978年,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前,这个时期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商品、劳务价格受到国家的严格管制,即实行计划价格制度,使我国经济生活中不可能出现明显的全国范围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主要表现为一种抑制性通货膨胀。但是在“大跃进”时期,由于经济政策的严重失误,引起物资供应严重短缺,货币超量发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无法再控制物价的上涨,出现了显性通货膨胀,不过,即便是“大跃进”的显性通货膨胀,也还是受到了国家的严格控制,带有浓厚的抑制性色彩。因此,“大跃进”时期的通货膨胀可以看作是计划经济时代抑制性通货膨胀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本章首先描述了1953—1978年我国物价的总体变动趋势,然后分析了“大跃进”时期通货膨胀的成因:一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膨胀拉上了物价;二是生产剧烈下降,物资供应急剧减少,引起物价上涨;三是巨额财政赤字主要靠银行垫款来弥补,引起货币的过量发行,导致物价上涨;四是银行信贷膨胀引起物价上涨。面对“大跃进”时期的通货膨胀,国家采取了五方面的措施进行治理:一是大规模压缩重工业和基建投资规模以遏制投资需求;二是压缩社会购买力,遏制消费需求;三是大力发展生产,增加商品供给;四是实施“银行六条”,严格控制货币投放数量和银行信贷规模;五是销售高价商品来回笼货币。本章第三部分分析了计划经济时代抑制性通货膨胀的三种表现形式:(1) 多重价格结构及其特殊运动形式是抑制性通货膨胀的表现之一;(2) 商品供应全面紧张,货币

向商品转化受阻，是抑制性通货膨胀的又一表现形式；（3）潜在购买力非正常增减，货币流通速度减慢，是抑制性通货膨胀的第三种表现形式。计划经济时代之所以长期存在抑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计划经济时代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是造成计划经济时期的抑制性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第二，财政赤字诱发通货膨胀；第三，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引起货币流通的不稳定。尽管政府采取了诸如控制需求、增加供给、改善生产结构、控制信贷规模等办法，但政府对计划经济时期的抑制性通货膨胀的治理是不成功的。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经济非常落后，而且还面临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亚太地区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挑战，民族自尊心和制度优越感驱使中国人民去“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追求高速度和高产值成为上至政府下至老百姓的普遍心声。尽快发展生产力，迎头赶上世界上先进的发达国家，这本是良好的愿望，但是，这需要从国内实际经济条件出发，要受到国家财力、物力的制约，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欲速则不达，并给经济发展带来困难。无论是国民收入超分配，还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显然都与这样的指导思想有关，即要求高速度增长，特别是生产资料生产的高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就会增加对财政支出和信贷支出的压力，从而迫使出现国民收入超分配的现象；也正是基于追求高速度增长，往往导致高积累率和投资结构的不合理。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在制度上却得到资金供给制的保证。例如，基本建设投资缺乏责任制，必然出现争项目、争投资、不讲效益的后果。财政和银行迫于保证资金供应的要求，往往超出本身资金力量提供资金，从而向流通中注入过多货币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计划定基建，基建挤银行，银行发票子”。由于头脑过热，试图通过经济跃进提前跨入共产主义，相应规定了经济发展的高指标；在资金供应上则实行哪里需要就供应到哪里，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

时候供应。其结果破坏了各种经济比例,引起通货膨胀。

第四章标题为“改革开放时期的转轨型通货膨胀(1979—1996年)”。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标志我国进入了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制度转型、结构变迁的历史时期。在经济转型时期,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断地冲破,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经济制度的变革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经济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波三折。其中,最大的波折可能就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不断受到通货膨胀的困扰。与计划经济时期通货膨胀不同的是,我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通货膨胀是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是体制转轨过程中的通货膨胀,因而具有新的内涵,这种通货膨胀可称之为转轨型通货膨胀。本章共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1978—1995年物价变动的总体趋势,第二至第五部分分别对1980年通货膨胀、1985年通货膨胀、1988年通货膨胀、1994年通货膨胀的成因、特点及政府的治理措施作了详细的描述与分析,第六部分对转轨型通货膨胀的经济社会效应作了分析。我认为,我国所发生的通货膨胀只会对经济、社会产生负面效应,不可能产生正面效应。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货膨胀损害了有存款余额的城乡居民、工薪阶层和农民的利益。第二,通货膨胀使中国产生了一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加剧了社会腐败。第三,通货膨胀不利于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第四,通货膨胀阻碍了改革的顺利推进。第七部分则分析了我国转轨型通货膨胀的根本特征,指出我国选择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战略,这个外生的战略必然会内生出通货膨胀,因此,通货膨胀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一个无法避免的经济问题。

第五章标题为“比较视野下的中国通货膨胀”。本章共四大部分,以时间为经线,以空间为纬线,从时空二维角度下比较审视了纸币制度下的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第一部分对我国金属本位制度下通货膨胀与信用货币制度下的通货膨胀作了比较,无论是

在金属本位制度下还是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中国都曾发生过通货膨胀，两种货币制度下所发生的通货膨胀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首先，两种货币制度下的通货膨胀都表现为货币贬值、购买力下降、物价上涨，但货币贬值的表现形式及货币贬值对物价的影响有所不同。金属本位制度下的货币贬值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铸币重量减轻、成色下降，使其购买力下降；二是贬值。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铸币仅以辅币的形式存在，因此，通货膨胀也只表现为纸币贬值，物价上涨，旧中国和新中国时期的历次通货膨胀都是如此。其次，两种货币制度下发生通货膨胀的成因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但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通货膨胀的成因比金属本位制度下通货膨胀的成因要复杂得多，因而治理也要难得多。再次，两种货币制度下的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影响不一样。金属本位制度下的通货膨胀发生时，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律。而在不兑现信用货币制度下的通货膨胀发生时，则出现所谓的“良币驱逐劣币”现象。第二部分对纸币制度确立后，旧中国通货膨胀与新中国通货膨胀作了比较，旧中国通货膨胀与新中国通货膨胀都是在中国确立不兑现信用货币制度之后发生的通货膨胀，因此，在通货膨胀的形成机理、治理对策、经济社会效应等方面都有诸多相似之处，当然也有许多不同之点。我认为，新旧中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区别在于成因上，旧中国执行通货膨胀政策，因而是政策性通货膨胀；而新中国则坚决不执行通货膨胀政策，因而能够在短期内取得遏制通货膨胀的显著成效，也能使通货膨胀不致长期存在。第三部分对我国短缺经济下和过剩经济下的通货膨胀作了比较研究。首先，两者产生的经济环境不同；其次，两者的成因不同；最后，在治理手段上有异。第四部分则把中国通货膨胀置于国际视野之下，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作了比较，第一小节对旧中国战争型超级恶性通货膨胀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其他主要参战国家通货膨胀作了比较，第二、三、四小节则分别对新中国通货膨胀与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

国家通货膨胀、西方发达国家通货膨胀和发展中国家（地区）通货膨胀作了比较。我国与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通货膨胀在成因和表现形式上有一定的共性，社会主义国家通货膨胀与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经济体制密不可分。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都存在严重的短缺经济和需求膨胀现象，而这正是诱发社会主义国家通货膨胀的共同原因。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国情不同，影响和形成通货膨胀的内生和外生变量也不尽相同，加上在改革目标模式及方法、步骤选择上的差异，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又有其各自的特殊性。首先，社会主义国家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各有特色。其次，社会主义国家通货膨胀成因上也有差异。中国通货膨胀与西方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的区别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西方发达国家之间通货膨胀有很大的相关性，而中国通货膨胀则与西方发达国家通货膨胀基本上毫无干系。第二，就通货膨胀的成因而言，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在表面上有相似之处，基本上都是因投放过量通货、需求拉上、成本推进、供求混合推进、结构性转换等，但各种成因的实际内涵却相差很远。第三，在通货膨胀的防治上，西方发达国家中央银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中国中央银行所起作用则很小。中国和东亚、南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在历史传统、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战略等方面都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使中国与东亚、南美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通货膨胀具有相当的可比性。但我国与东亚、南美地区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通货膨胀既有相似的一面，也存在不同的一面。不同的一面是由国（区）情、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同所带来的，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不同；第二，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不同；第三，我国的通货膨胀除了一般发展中国家（地区）通货膨胀的特点（如结构性供给不足）外，还具有转轨国家通货膨胀的一些特点；第四，结构性通货膨胀压力的成因不同；第五，通货膨胀的类型不同。

通过对中国通货膨胀史实的分析，发现菲利普斯曲线所表达的含义并不适合中国实际，所以，我们绝不能执行以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关键词：**信用货币制度；通货膨胀；比较研究

## Abstract ■ ■ ■ ■

In 1935,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mplemented its legal currency transform; it was called the abolition of the system of white silver standard, and confirmed that the currency issued by 4 institutions ( the Central Bank, Bank of China, Bank of Communications, and the Agriculture Bank of China) had unlimited potential of legal payment. Such non-fulfilled credit monetary system claimed that the legal currency was able to be exchanged into pounds and U. S dollars, therefore the value of the legal currency can be tested by the exchange rate.

Since 1938, inflation began to show itself in the mainland, and wa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eteriorated, when the national party collapsed and was driven off the mainland, the inflation was so wore and unreliable that it was not worth mending. As the new government came into power, the inflation was unlikely to vanish automatically with the passing of the old authority, but the new people's authority controlled the hyperinflation successfully only in several months which created one of the greatest miracles of the world's financial history. The Chinese economy had to return to the war mode as the Korea war broke out in June 1950, when inflation remained in the mainland all along. Our first five-year plan began in 1953 and our country also implemented its highly centralized and planned economic management system from 1953 to 1978. It was due to the fault of the serious economic policy in the "great leap"

period that there became a great supply shortage and the currency issuing was overloading. At this stage, the government couldn't keep the price any more and the dominance inflation appeared. Such inflation was regarded as a special experience of inflation restricting in planned economic period and an inflating pressure did exist throughout the time. We started our reforming in 1978 and plan and market did join hands in one arena, which was called, in an economist's mouth, dual track system or transforming period. Now the position was, the long suppressed inflation in the planned time was gradually liberated by the thrusting of price reforming and the deepening of the economic monetization. From 1979—1996, 4 inflations appeared in china, i. e. 1980, 1985, 1988 and 1994, which become the main factor hampering the rapid, steady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In short, we can learn that in the majority of more than 60 years,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credit currency system in China in 1935 to 1996, inflation was kept to show its existence, so that in historical respect,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general and fundamental could deepen our recognition of the particularity of Chinese inflation, such comprehension no doubt was a privilege of future solution of the inflation case.

The whole article consists of 5 parts ( with neglect of the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 which gives the predic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inflation case in China from 1938 to 1996.

The first part is titled with "The super hyperinflation due to the wars in old China (1938—1949)". In this part, a description of the inflation status during 1938—1949 period is given first, and the followed phases are reasons, social &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inflation during the anti-Japan war and the liberation war, the

management of inflation and wh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lost in the campaign.

The second part is titled with "The inflation during the restoring period of national economy (1949—1952)". First, this part indicates the 4 inflations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new China, then, discovers the reasons which cultivate the inflations. They are: (1) the huge deficit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the supply could not meet the lowest demand of the people at that time and such imbalance led to the shooting up of the price; furthermore; (3) speculations deteriorated the inflation; (4) the anticipation of inflat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real ones.

The third part is titled with "The restricted inflation during the planned economic period (1953—1978)".

The fourth part is titled with "The transforming inflation during the reforming period (1979—1995)". In this part, I try to explain that the inflations in China can only produce negative effects upon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the causes lie in four factors: (1) inflation erodes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who possess savings; (2) inflation produces a new vested interest group and enhances the social corruption; (3) inflation does harm to the steadily long-term growth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4) inflation hampers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the reforming.

The fifth part is titled with "The Chinese inflation in comparative vision". This part is divided into four phases, which contemplate and compare the inflation case in credit currency system in two dimensional shapes, with time as the longitudinal structure, and space as the transverse skeleton.

From these we can go on to the fact that the meanings of the

Philips Curves can not readily be fit for the Chinese experience, so that in this respect we must not implement the policy which stimulates our economy by inflation, and this is the conclusion of the article.

**Key Words:** Modern Creditable Currency System; Chinese Inflation; Comparison Study